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文 化 类

被奴役的性

[美]凯瑟琳·巴里 著
晓 征 译

*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文化类

汉译
精品

被奴役的性

[美]凯瑟琳·巴里 著
晓 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奴役的性/[美]凯瑟琳·巴里著;晓征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9

书名原文: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

ISBN 7-214-02789-5

I.被... II.①巴... ②晓... III.女性-性问题
IV.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611号

书 名 被奴役的性
著 者 [美]凯瑟琳·巴里
译 者 晓 征
责任编辑 沈晓平 蒋卫国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2
字 数 263千字
版 次 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789-5/G·927
定 价 17.0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1 被奴役的性 18

性的社会建构:非人性化的四个阶段 26

那么什么是强奸? 32

性秘密 34

超越界限 36

谋杀 40

2 性权力 48

性剥削发展的历史阶段 49

性文化和性的建构 53

性奴役 56

性是一种劳动? 63

赞成卖淫 66

性权力关系 70

女权主义的政治觉醒与意识形态 75

3 约瑟芬·巴特勒:第一次抗议浪潮 88

-
- 4 性的产业化 119**
- 军用市场;韩国 123
 - 性旅游;从军用到商业市场 134
 - 妇女买卖;邮寄新娘 146
 - 西方性产业的发展 153
 - 性剥削的产业化 154
- 5 妇女买卖 163**
- 从巴基斯坦到孟加拉国 164
 - 尼泊尔人被拐卖到印度 169
 - 经济不平等;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妻子和丈夫 172
 - 从婚姻封建制度到经济发展;从拐卖到性的产业化 181
 - 卖淫区;从拐卖到性产业化 191
- 6 拉皮条:最古老的职业 198**
- 皮条客与妓女的关系 199
 - 皮条客的规矩 202
 - 驯服 207
 - 警察的残暴 213
 - 逃跑 215
 - 结论 217
- 7 国家:父权制法律与卖淫 221**
- 禁止 223
 - 管理 227
 - 支持卖淫的新法规 232
 - 废除主义 234
 - 法律;以不合理的方式承认侵害 238

-
- 艾滋病 240
- 8 帕特里西娅·赫斯特:女性性奴役的原型 250**
- 对 1994 年序幕的说明 250
- 撒谎 260
- 帕特里西娅谈幸存 263
- 逝去的岁月:她是帕特里西娅还是坦妮娅 265
- 暂时性 267
- 女权主义和左派 271
- 忠诚 273
- 9 人权与全球女权运动 275**
- 忘却中的沉默 276
- 记忆、康复和觉醒 279
- 治疗:个人的方法 288
- 根本的变革 292
- 联合国:妇女人权的可能性? 297
- 新女权主义人权 299
- 妇女是人吗? 303
- 无法忍受 309
- 附录:反对性剥削公约(1994 年 1 月草案) 315**

导 言

性剥削把妇女客体化,变成了性;这种性导致了对妇女的暴力,把妇女变成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性剥削是使对妇女的压迫变得社会规范化的基础。研究这个课题是艰难而痛苦的,在撰写《女性性奴役》一书时,我就想逃离这种痛苦。当时我写道:

我曾跟一个朋友谈起女性性奴隶问题,她说我可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当时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20世纪60年代末,当我发现几本记录当时一些做法的家长式的书时,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震惊和恐惧。在此期间我还读了约瑟芬·巴特勒的传记,她在19世纪独自一人发起了一场影响波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反对强迫卖淫的运动,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她了。我知道约瑟芬·巴特勒的鲜为人知与当今性奴役问题的被忽视是有直接关系的。于是我就这个问题写了几篇小文章,并且把我所掌握的一些信息编入我所教授的妇女问题课程中。

然而,花两三年的时间来研究女性被奴役的问题并就此写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本能地回避这个建议;我无法面对它。可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这个想法定下来后我意识到我的反应是典型的妇女的反应:即使

是对事实有了一定的了解,还是从害怕到无能为力直至躲避。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无论就我个人还是其他人来说,让我们不再躲避、不再束手无策的惟一方法就是彻底地了解对妇女的性暴力和性统治。正是因为我们从知识那里退却,知识也远离我们而去。通过了解和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怎样通过设想和创造一个没有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世界来确定我们的方向,从压迫中解脱出来。在了解我们所受压迫的程度后,我们必须立即找到一些方法来打破从害怕到回避到否认直到被奴役这样的—个致命的怪圈。

研究并撰写这本书(《女性性奴役》)没有让我害怕面对这个问题,相反,对它的认识使我的研究超越了对女性的压迫这个范畴。在了解了女性所受到的性奴役的范围和它的深度后,我无法忍受和它一起消极地生活下去。我必须用现实的态度,设想一个用某种方法来消除了这种奴役的世界。阅读有关性奴役内容的书需要希望和梦想。

那是在 1979 年。

由于我觉得研究妇女生活的现实是一种痛苦,在那以后的 10 年里,也就是在 80 年代,我把工作转向了其他领域。1980 年,就在《女性性奴役》刚刚出版后,我在哥本哈根的 80 年代中期妇女大会期间召开了几次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这次大会产生了 1983 年在鹿特丹召开的国际女权主义大会。我要感谢芭芭拉·古德,她的工作网络使参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提出了一项由我们起草的关于卖淫的议案,这项议案被 1980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会议所采纳,它对这项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开展国际性的女权政治活动来反对性剥削也招来了支持游说者——那些积极赞成

卖淫的组织和个人——几年来我和我讲授的课成了他们攻击、破坏和痛恨的焦点。

回到美国后,我发现70年代我参与发起的我们自己的反淫秽品的女权运动已经和由此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法律手段一起逐步升级,有了反淫秽品法的女性民权,即我们所说的“德沃金—麦金依法”。政治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把精力放在反对淫秽品的斗争中,向性解放和彻底的自由挑战,反对他们所赞同的对性的滥用和剥削。这就带来了“性违法者”;同性施虐—受虐狂以及躲在她们的色情的性生活后面的异性恋的妇女一起形成了“女权主义”的反审查制度行动力量。激进女权主义就像一个世纪之前一样受到围攻。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发生在妇女运动中的转化,这种转化把妇女运动变成了一个单一问题的运动。我们知道一个单一问题的运动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它与妇女受压迫的整体分离开来了。

我发现自己在国际运动的建立中处在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位置上,回到家乡参加我们的运动,却发现自己女性性奴役问题是孤立的。我举办有关卖淫问题的讲座,认为它是性剥削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却被运动当作是一种“附加物”,一个与反对色情和性暴力工作相关的问题,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所有的基本问题都触及过了。

1983年在鹿特丹组织了一次有关女性性奴役的国际会议后,那里的支持卖淫者和西方自由主义者对我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了不断的暗中破坏和人身攻击,使我心力交瘁,我对几个赞同女权主义的朋友,包括一直支持我的罗宾·摩根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已尽了全力。我解释说,即使是在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之后,我依然孤独,我在退却。但他们还有别的计划。他们在为我一直所致力于其中的国际网络工作如何可以掀起一次新的非政府组织的新浪潮而兴奋着,这是与联合国有着协作关系的非政府组织。(当

罗宾晚餐时作出这个提议时,我在饭店里大声地悲叹。)我与很多国际性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起工作过,我能看到全球的女权主义觉悟的潜力正在不断地扩大。我一直从事的关于买卖妇女问题的国际网络工作使我们的人权团体能够与联合国合作。

然而那时,包括现在,我都不赞同单一的妇女运动的主张。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再孤立无援,尤其是在西方妇女中间,可我不得不为非政府组织的事务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这项工作,以及做报告的要求和为受害者组织的活动,都让我顾不上个人的决定,甚至不理睬它给我的健康造成的损害,更不要说我的事业为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到 80 年代中期,事情终于有了一些变化。艾维莉那·吉奥伯在美国组织了 WHISPER (Women Hurt in Systems of Prostitution Engaged in Revolt)。苏珊·亨特组织了卖淫改造委员会。

尤其是在亚洲,妇女们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对性产业及其消费者。我有幸和一些有贡献的女士一起工作,例如奥罗娜·杰维特·迪迪奥斯和菲律宾组织小组,日本的 Yayori Matsui,印度的吉恩·德昆娜,还有孟加拉国的西格玛·胡达,她们对亚洲女性受到性剥削的问题有着很深的感受和精辟的分析。

到了 1987 年,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要永远地把我的研究转到其他问题上去。在纽约的性自由和攻击女权主义的会议上,我又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我们的运动中,向 1500 名与会的女权主义听众提出不要让卖淫和买卖妇女的问题变成一个单一的妇女运动。我请他们采纳这个方案,而且强调说:“不要叫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没有人来找我。我所不知道的是在那段时间里,1987 年组织了大会并且通过妇女反对淫秽品组织成为激进女权主义行动先锋的多尔琴·雷德霍特真正接受了这个议题。1988 年,她和几位女士正在筹划一次关于买卖妇女的国际性会议。多尔琴寻求信息和论述的要求把我从短暂的间歇中又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不过

这一次和过去不同。从国际女权运动我们发起了反对买卖妇女联合会,这是以我在1979年出版的《女性性奴役》为基础的。但当时反对买卖妇女的国际性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项女权主义运动。

当我们共同工作并在联合国取得非政府的地位时,我们发现了阐述妇女人权的新途径。1986年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卖淫问题专家会议上,我是报告的起草人。那次次会议表明,目前的联合国公约明显已不能表述性剥削问题。我记得我告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处的瓦西拉·塔姆萨莉,这五天的会议是自我撰写《女性性奴役》以来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分析。7年的时间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这些新的主张让我在1991年春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了合作,使国际人权法的一个新的模式得以发展,即《反对性剥削公约》。在这样的契机下,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于1992年在国际上形成了《反对买卖妇女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络工作的《行动计划》的基础。瓦西拉·塔姆萨莉和我倡导的这个计划需要大家的共同行动来创造一个国际网络,反对性剥削,尤其是侵害妇女人权的卖淫活动。特维斯·巴特勒和玛丽·乔恩·瑞加伯以及国际妇女组织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给了我们鼓励并帮助进行网络工作。

虽然对女性的性奴役非常严重,虽然世界范围内的买卖妇女活动还很猖獗,还有支持卖淫行业的游说者,但与70年代中期我研究并撰写《女性性奴役》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在那时,由于卖淫和买卖妇女是悄无声息的,因而它与妇女运动之间是分离的。当它在别处无声无息时,欧洲的普隆·法尔考、瑞妮·布里德尔、苏珊娜·科帕斯和安妮玛·巴萨克则长期坚持着有关这个问题的运动和行动。他们带来的是希望、支持和友谊。但是在研究方面,卖淫被当作是妇女异常化的一种形式,属于犯罪学领域,人们认为它是不可避免但却是可以控制的。自19世纪约瑟

芬·巴特勒发起的战役之后,买卖妇女就转到了地下。但是1986年我在北卡罗来纳参加库克·蒂尔组织的一次会议时听艾维莉那·吉奥伯说起她新近组织的WHISPER时,我的眼里含着泪,我知道这样做是值得的。

在妇女运动的初期,也就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渴望了解历史,寻求理论,我们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有关过去女权运动的资料。我们为女前辈们所犯的明显的政治错误所震惊——那是一个在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中对他们来说不太容易发现的错误。在激进女权主义者反对对妇女最广泛、最深层的剥削和暴力的斗争进行了20多年后,美国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她们把焦点主要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选举权。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实用性也很明显:妇女如果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就不能使她们自己的其他要求获得满足。

但是这种从反对压迫的激进女权主义到强调法律改革的单一问题运动的战略性转变却是结束的开始。当妇女实现获得选举权的目标时,妇女运动也就完结了。要让妇女能够为妇女而使用投票权至少要再花70年的时间。

在25年前掀起这第二次浪潮的时候,我们激进女权主义者就发誓,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我们的激进运动是一种单一策略的运动,我们不会放弃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这样做会使我们的革命退却,把我们的斗争变成对个人的攻击,变成法律改革。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性剥削问题不仅被变成了单一问题的运动,而且被具体成了只是(或至少主要是)一种法律上的变化。但是父权制是永远也不会把自己变得不合法的。保护妇女的新的法律很久以前就制定了,为争取这些法律而进行的斗争就是女权主义者制定新的标准的开始。我们的斗争必须超越法律,去改革妇女受压迫历程的根源。我认为法律改革是我们运动和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

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支持并促使了从法律上提出反淫秽品的公民权利,并且我还促使了新的国际法的形成。法律对于一个受到强烈感染的美国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它只是根本性改变的一部分。最首要的事情应该是男性行为的改变。

90年代我们发现美国的妇女问题已经变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只有孤立的、用委婉语“选择”来表达的争取堕胎权利的运动,而同时委婉语“选择”已被性自由主义者和卖淫游说者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他们通过他们所支持的淫秽品和卖淫来实现的性剥削。他们问道,难道不是妇女“选择”了卖淫和淫秽品吗?(似乎这个问题与消费方有些关系,比如说由男性推动的市场。)与此同时,我们的运动已变得相互分离,以至于如少女怀孕和赞成选择之类的问题,即少女选择堕胎的权利与产生少女怀孕危机的环境相分离:性剥削——即通过淫秽品和使卖淫合法化来使社会大规模地性别化并且助长了低龄化的性行为。

女权主义者的计划由于问题的分裂而受到损害。我们发起的一些女权主义计划也在缩减,比如说70年代早期的强奸危机计划以及80年代的社会工作计划。这也进一步解构了女权主义的政治信仰,使之变成了革命的变革。其结果是我们这些激进女权主义者被孤立,由于我们坚持认为性剥削是压迫的一种状态,因而成了性自由者和卖淫游说者攻击的目标。

反淫秽品是怎样成为一个与其他问题分离的女权主义行动的?尤其是与卖淫、强奸、性骚扰这样的问题相分离。当女权主义反淫秽品的政治行动逐渐升级的时候,它就分离成了一个独自的特殊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分离是由于性自由者的攻击而被迫形成的。在这场几乎是殊死的斗争中,激进女权主义开始变得越来越专注于反淫秽品,因为我们严阵以待,为生存而战,这和苏珊·B·安东尼在19世纪不顾一切地把重点转向一个单一的问题——选举权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安德拉·德沃金和凯瑟琳·麦金依所发展的反淫秽品法令把淫秽品定义为“妇女的明显的性从属”。这个定义是一个广义的答案，扩大了运动的范围，因为它指的是女性共同的阶级状况：受压迫、被主宰。所以即使是这一运动已不再是在最完全、最广泛的问题的中心，甚至已不再有最重要的东西——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为就是在它们的联系中我们揭示了对妇女的父权统治的复杂的网络是一个阶级——革命斗争在反淫秽品工作中仍是固有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诫我们，不要把问题从一个单一的转向另一个单一的。当我们着手一个“新”问题时，去年的问题变成了一种治疗方法或社会工作——也许很重要，但却是无政治意义地个体化了。

70年代后期，我在写《女性性奴役》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一本关于卖淫问题的书。我在研究下一个“新”的妇女问题（由于已经确立）时也没有意识到。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致力于把由卖淫造成的对妇女的暴力列入女权斗争中去，并且把它作为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之一列入最前沿的女权主义议事日程中。在这项斗争中，我没有把卖淫的妇女看作是另一群人，那是一种讨厌女人的做法；而是把她们看作这样一种人：她们受性剥削的经历和所有妇女受性剥削的经历是一致的。

我在撰写《女性性奴役》时所做的事情，就是阐述性（性别）是如何被作为一种权力来使用的，即指一种压迫的形式，一种对人的控制。我很关心阶级状态。我当时以及现在对性权力的研究必然地、不断地、无情地迫使我把研究重点转到卖淫问题上。那时我知道除非一个人能够非常完整地解压迫的阶级状态，否则他就不能动员人们来反对它。于是我的工作就是研究性权力，用它最激烈、最完全、最制度化、最具体化的形式来揭露它。我认为因为我们了解全部，所以我们能了解它的各个部分。从1970年起，我就致力于发起反对强奸的激进女权主义行动，但是，在我了解了买卖妇女、考察了卖淫中的拉皮条伎俩之前，我还不能说是完全知道在

男性的统治下女性的生命是多么地毫无价值,女性是可消费的,女性是可以随意扔掉的。而卖淫则是一切性剥削的基础。

为了从战略上、政治上来面对整个女性的阶级状况,我在全世界人权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行动,因为性是附加在所有妇女头上的权力。由于妇女状况是一种阶级状况,因此性权力必须被看作是一个全球问题,包括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时它所有的现象。要做到这一切,卖淫问题在这一斗争中必须被列为中心问题。

我选择了把我的战斗精神和战略重点放在反对人权压迫上。在我竭力赞同个人权利的同时,也相信人权可以进一步深化。扩大到人类的状态,它承认各个民族——那些处于种族隔离下的民族,以及在任何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下的民族——都有权利自己做出决定。对我来说,人权的要求就是它能够保护这个阶级,保护大家共同的社会地位——而这是一种妇女还没有得到的保护。然而,受到性剥削的妇女阶级的非殖民化还没有开始。1970年我参与发布了《第四次世界宣言》,这是为了对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作出回应,他们试图同化妇女运动,使它服务于左派,似乎男性不是性的帝国主义者。在那个宣言中我们把对妇女的殖民化当作父权制的一种状态。联合国将保护“所有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和他们的领土完整”^①,在我们当前的人权工作中,我认为妇女就像一块受到性殖民化的领土,应该受到那样的保护。随着我们运动斗争的开展,终有一天我们要根据联合国为其他人制定的人权标准,使性剥削被当作一种阶级状况,被当作是一种与对任何一个人犯罪同等的对人类的犯罪。

于是,在《女性性奴役》一书的研究中,我把性当作一种权力,我发现所有妇女的阶级状况都能从卖淫问题中得到充分的揭示。这一发现让我用了近20年的时间来形成一个国际人权途径来面对全球的阶级状况。

但要在斗争中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回到激进政治女权主

义最初的前提下：即个人是政治的，所以把他们分离成“妓女”、我们、“妇女”是完全错误的，是父权主义的谎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谈论性——当今的性，不仅是在淫秽品中，也不仅仅是在它明显地“违背了我们的愿望”的时候。

在这本书中，我的重点由过去的卖淫中的性转到对性的奴役上。我把卖淫这一所有性剥削中最极端、最具体的形式作为典型。性剥削是一种政治状况，是妇女从属地位的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对女性的歧视。

这一研究的女权主义国际途径表明了妇女的从属地位有着全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因此必须有一股共同的力量来唤起超越了种族、阶级和国家界限的共识。对“性别”这个词，女权主义者的解释是指性归属的社会基础并由此揭示出性的政治含义，这个词已经被学者们中性化了，因而现在它仅仅意味着性别之间生物上的差异。“性别”已经成了一个无政治意义的词，它使特别指出“女性”变得不再有必要。“性别”使父权这一权力的历史与政治渊源不复存在。这就是今天为了保护对女性的统治而使女性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性奴役的前因后果。

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父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语言已经被非政治化和中性化。在本书中，我把卖淫当作制度化和工业化的对女性的性剥削来研究，这种剥削是由父权制的封建主义发展而来的。从理论上说，我已经作了全球妇女状况的宏观分析，它应属于人类的相互作用和个人经历的微观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本书跨越了“宏观 - 微观”的界限来探索性剥削问题，无论何时，当研究被局限于这一层次或那一层次时，这一直是个问题。从女权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从个人到政治的跨越。它承认性剥削是把所有妇女都包括在卖淫中的一种状态。随着卖淫变得工业化，全球的经济也形成了国际关系，对于女权研究和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来说，把这些不同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对于研究卖淫问题,传统的标准已不再适用。由于卖淫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因而,从事卖淫的人数除了一般的统计之外没有可靠的数字。即使是在视卖淫为合法的地方,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不合法的,它被有组织的犯罪所控制,要估计人数是非常困难的。在人口统计资料和妇女发展趋势的研究资料中是不包括从事卖淫的妇女人数的。

有关买卖妇女儿童的可信信息和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渠道:1.人权组织,他们主要关注儿童和在赤贫状态下“自由”和“被迫”卖淫之间的区别;2.艾滋病活动分子、研究者和基金会,他们在过去的5年里开始涉及卖淫问题,认为卖淫是传播艾滋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这一立场来关注这个问题;3.女权组织,他们关注的是女性的权利和人权,以他们特殊的视角与其他两种组织一起关注着这个问题。只有女权或人权组织和活动分子对助长买卖人口和性产业化的状况做出了全面的研究和处理,因为只有他们在关心妇女(因此还有儿童、艾滋病和贫穷)。所以,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建立于第一手观察资料和主要由这些组织所提供的文件和统计资料之上。在卖淫、性交易和性产业化这些问题上,由国家政府提供的报告、统计数字和估算是最不可靠的。坦率地说,地方警察和边境的士兵都卷入了非法交易和贿赂事件。实际上,有些国家政府的官员也证实了由于一些非法的交易被人权工作者曝光而使政府名誉受损。

好方法的综合才是揭示现实的最好方法,除此之外都做不到。尤其是因为这个现实是维护剥削制度的。^②我在研究性剥削时采用的方法是:

1. 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搜集有关妇女卖淫和买卖妇女的资料,并追溯它们的历史以求弄清它宏观或全球的模式和趋势,确定西方和它的全球经济控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
2. 在研究个人受到性剥削,尤其是卖淫时,采用一种象征性